

共產國際問題研究叢書

袁 伯 琦 著

共 產 國 際 史 略



獨立出版社印行

袁伯琪著

共產國際史略

獨立出版社印行



3 1763 0677 1

共產國際問題研究叢書總序

這一套研究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問題的新書，共計十四種：

一、共產國際史略

二、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

三、共產國際與蘇聯

四、共產國際與世界革命

五、共產國際與遠東革命

六、共產國際之勞工政策

七、共產國際之農民政策

八、共產國際之青年組訓

九、共產國際之黨派鬥爭

十、第三國際的解散與一國社會主義建設論

十一、唯物辯證法之檢討

十二、無產階級革命與國民革命

十三、共產國際解散後在各國的反響
各種固各有其所代表之內容，現在不必而且不容來詳細介紹；但綜合倒需要幾句話來說明它。

關於共產國際的問題，原為許多作者和讀者所注意。但是，據我們見識所及，從沒有一個作者會把共產國際之思想與活動，做一種比較完備具體的研究。反映於讀者方面，即很少有澈底的瞭解，明白的認識。這種疏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完全正當的慾望，把注意力集中於蘇聯之實際成功；一方面是由於許多不必要之疑惑，把觀感拘於一時一地。蘇

聯近年的建設，的確是具驚人之成績，事實告訴我們，這完全是國家民族意識一偉力之顯示。同時共產國際之本身，和無產階級之世界革命，現在已被唯物辯證法的歷史觀所否定。故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不獨學術上有其必要，自然更不須有其他的考慮。

尤其在我們中國，第一、自五四以後，一切新思潮新主義如潮湧而來，雖經過三民主義的激盪，漸見澄清，其尚未完全糾正一般思想之左傾幼稚，仍屬顯然。第二、國內有些青年思想左傾幼稚之原因，主要是由於他們沒有機會去研究共產國際之思想和行動，被片面的宣傳所麻醉，終難明其內在的矛盾，和許多迂腐不健全之理論。第三、共產國際在遠東，曾建立有相當的基礎，今日它本身之解散，對於中國之內政外交，即有極大的影響。這套叢書編輯之動機，即希望國人基此三點出發，鑒往勵來，撥開迷霧，早見青天，走上三民主義建國之大道！

編者一九四三年八月於重慶

目 錄

- 一 共產思想之起原與其初期活動
- 二 第一國際時代
- 三 第二國際時代
- 四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之經過
- 五 共產國際之組織
- 六 共產國際之活動
- 七 共產國際之解散

目

錄

—

共產國際史略

一 共產思想之起源與其初期活動

共產國際，又名爲第三國際，前者是標明它的性質，就是說：這個國際組織，乃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最高機關，而以掀動世界革命，造成各國一律採用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爲目的的；後者是指出它的歷史關係，就是表明：這個國際，乃是繼承第一與第二兩國際而來的。究竟言之，則共產主義者之有國際組織，並不是第一國際始，在第一國際以前，早已有共產主義同盟存在，而第一國際，實際乃是由它改組而成的。既然是如此，那就來我們說明共產國際的活動經過，首先即須從它的先驅者說起。

本來人類在蒙昧時代，是度過一次民族共產時期，即至游牧時代，個人私有土地的觀念，也還沒有完全成熟，比如現在的蒙古，其牧地即是屬於部落所有，而不是屬於個人所有的。然而我們知道，社會是進化的，其組織之由部落以成爲國家，其生產方法之由漁獵遊牧以進於農工，其生產手段之由共產以成爲個人私有，乃正是表示它的進化過程，在此種過程中所表現的狀況，是相互依存與制約，有其一必有其二的。具體言之，即生產方法斷進於農工的現代，則依隨它而發生的生產組織，亦必然會成爲私有形態，這是人力所無可

如何的。因此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一方面既承認現在的生產方法之爲進步與優良，而他方面又希冀使生產組織反於古代的形態，這不獨是事實的不可能，而且根本即屬謬誤的倒退思想，絕無可以供考慮的價值的。

自然，我們不能不承認，社會制度，無論那一個時期，都是有缺陷的，而人類的欲望，又是在不斷的提高與演進之中，總希冀達到至善至美的境地。惟其理想與現實之間有這樣一個距離，於是一般思想家，對他當時的社會制度，便有許多消極的指摘與積極的改造方案提出，而社會主義的思想即屬其中之一種，共產主義，又屬社會主義中一個派系的名稱。

此種思想的產生，不是近代始。遙遠的古代，柏拉圖即造出了一個理想的共和國的圖案，以發抒其對現實私有財產制度不滿意的情緒。一五一六年，英國又出現了摩亞所著的『烏託邦』一書，在那書中，摩亞一方面盡量指摘當時的政治經濟不合理的情況以及其所產生的弊害，他方面，則臆造出一個美滿無缺的國家，在那國家中，財產公有，男女無別，每個人從事六小時的工作，便可快快樂樂的過他的生活。稍後一點，又有好幾位思想家，發表如上所述的同樣的意見，這種意見，都是爲近代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開其先河的。不過就另方面而言，這種思想，不過是社會進化中一幅遙遠的幻景，怎樣使這幻景成爲事實，則即在提出者的本人也是沒有加以指出。所以它畢竟不過是幻想而已。

繼承前面這一種幻想把它嚴正地提出來，作爲一種可能現實的政治主張，而且不惜以一生的精力以冀其主張之實現的，則是到十九世紀初期才有的事。提出此種主張的代表人物，最初有法國的聖西蒙（一七六〇—一八二五）與傅立葉（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及英國的湯文（一七七一—一八五八）等三人。聖西蒙在青年時代，以經營土地投機營業，積下一筆很大的財富，後來他因爲同情於貧民的困苦，不惜捨棄其本身職務，從事於社會改革運動，以致到晚年時，便陷於傾家蕩產，而在極度的貧困中自殺殞命，這種捨己爲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不過他所提出的改造社會的方案，却仍然是一種烏託邦的幻想，曾由他本人以及信徒好幾次加以實驗，都無往而不失敗，到一八三二年以後，便再沒有去重蹈覆轍了。

傅立葉是一個網織商的兒子，他的改造社會的計劃，也與聖西蒙相同，都是以人道主義爲出發點。其具體的辦法，亦大同小異，他設計在一塊三平方哩的土地之上，組成一個約四百家族的共同生活集團，在這集團中，每一成員，都可以得到一個適如其願的工作機會，憑着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共同生活。在此種生活之下，由於財富與工作機會的均等，因此人與人之間，便不會有嫉妒與仇恨及鬥爭的事實發生更不會有那醜惡的軍國主義與集團屠殺的事實出現。這是他所設計的一幅理想社會的輪廓。他與聖西蒙有一點不同的，就是聖西蒙主張集中主義；承認有使用權力的必要，而他則反對以國家爲中心，主張以共同

生活集團，來代替國家作用。因此前者成爲共產主義的鼻祖，後者則導成爲無政府主義。實則這不過是他的幻想，比較聖西蒙更美麗更進步而已，其不可能成爲現實，則是殊途同歸的。

湯文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除掉他的社會改造計劃是屬於空想外，到是一個脚踏實地的企業經營家。他十九歲的時候，即在曼頓斯透一個紡織工廠的廠長，由於他具有卓越的經營才能，遂使其業務一天一天的發達而財富的蓄積亦日多。如果照共產主義的理論來推斷，那他毫無疑問的，是工人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者，而他所積聚的財富，亦是由於利用壓迫剝削的手段，所獲得的剝削的價值，但事實却剛剛相反，他不獨不是一個爲富不仁的資本家，而是一個存心仁民愛物的社會改良主義者。他的社會改革計劃，最初是實現於他自己所主持的工廠中，盡可能的縮短工作時間。改良工人的待遇，提倡勞工教育，創立一種不以營利爲目的的工廠商店，消極的禁止酒類的販賣，積極的供給工人以廉價的日用品，並於廠內創設幼稚園以撫育婦女勞動者的嬰孩，爲了舉辦這些勞工福利事業，他雖然費去了一筆很大的財富，然於他的企業上的收入，並無妨礙，所博得的，是勞動者極誠摯的敬愛與社會改良家的聲譽，如果循此發展下去，他的成功却是不可限量的。然而過了一個時期，他的興趣竟完全轉到社會改良方面去了。一八一七年，他向英國議會提供一個與傅立葉相類似的社會改革計劃，即選擇一個適宜的地方，約集一千二百左右的住戶，組

組織一個共產集團，經營自給自足的共同生活，以爲社會改革的示範場所。他以爲，此一場所成功後，則各處必會羣起仿效，而其全部的社會改革計劃即會逐漸的底於成功之域的。此種計劃，曾一度獲得維多利亞女王之父堪威侯爵和泰晤士報的贊助與支持，很有可能的爲英政府所採納，但因有一次，他偶然吐露了反對宗教的意思，遂引起了人們的疑忌而對之加以鄙視了。然而在他自己，却並不因此灰心，仍然照樣的計劃進行，先後與其信徒，選擇了兩個地方，實行其理想社會的組織，可是却同聖西蒙一樣，經過好幾回實驗，都徹底的失敗了。而他即在失敗後默默無聞的死亡，其晚景是很潦倒淒涼的。

以上所述，是十九世紀初葉幾個主要的社會改革家的思想以及其活動的概略情形。究實言之，則此種思想與動的存在於當日的社會，實在是普遍的，這種普遍的思潮，不過是藉這幾個人的言論行動來作有系統有計劃的反映而已。換句話說，即生存於當時的人們，對他們所遭逢的社會制度，經濟組織，是不滿意的人多，而認爲滿意的則極少。惟其大多數人均不滿意於當日的社會情況，經濟組織，於是便有改革要求的提出，故此種要求的提出，決不是憑空從天外飛來的，乃是對現實社會制度的不滿情緒中產生出來的。所以我們爲追溯其發生的原因起見，還須把當日的社會情況，簡略的加以說明。

我們知道，一七六〇到一八三〇年這一個時代，是產業革命的時代。此一時代之特殊變徵，是從前必須由人類用手去做的工作，現在可用機器來代做了。機器代替人類工作，

這在文化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進步。此種進步所產生的效果，舉其重要而言，有下列四種：第一是提高了生產的效率與牛產品的數量；第二促進了城市的發達與工商的繁榮；第三是節省了人類的勞力使其有更多休息機會；第四是縮短了人與人的相隔距離加多了彼此間的接觸機會；還有許多給予人類以極方便的事情。總之，它所產生的優良效果，如果每個人都能平均享受，不被少數人所獨佔或濫用，成爲壓迫或剝削他人的工具，那是極可贊美而應受歡迎的。無如世界上任何一種制度，真是所謂『利之所至，害亦隨之』。此種新生產方法所給予人們的利益，固然很多，而其所造成之弊害亦復很大。最主要的，是因生產事業的集中，使得生產工具成爲少數人所獨佔，那般獨佔生產工具的人們，在營利第一這一前提之下，便不能顧及工人的權利與自由意志，祇知盡量的使用各種苛刻的方法，以滿足其無限的營利欲望，這樣一來，遂使少數人的幸福與多數人的痛苦成爲反比例的增加，這自然會引起身受者的怨恨與抵抗，人道主義者的仗義執言，代鳴不平了。其次：在此種新生產制度之下，不獨舊日的手工業勞動者，因處於劣敗的地位，會被擯斥於生產事業之外，即規模較小與條件不甚富備的企業，亦會爲大企業所排斥而不能存在。同時由於供給與需要之因無計劃而不能維持均衡，便會使企業發生週期的恐慌，有利可圖時，則日夜加工，拼命生產，致造成貨物堆積無處可消的現象，市況蕭條時，則裁員減工，甚至全部停閉。這樣一來，遂使失業人數日益增加，而倚仗工資以維持生存者，其生活毫無保障。凡

種，均是近世工業制度所形成的幾個最顯著的弊害，亦即是社會主義的思想與運動，所以此種在十九世紀初葉蓬勃興起的一個原因。

在如上所述的這種情況之下，對新生產方法所形成的新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提出彈劾與控訴的，不止是聖西蒙、傅立葉與渦文等三人，而是整個的各國的勞動者，聖西蒙等所代表的，不過是當時整個勞動者的共同意志而已。在此一共同意志之上，他們為謀對付起見，因此工廠所在地他的各城市中，便產生了許多的勞動團體。此種團體，起初是流行於英美法這幾個產業最發達的國家，後來隨着工廠制度與機器生產方法之普遍的採用，遂使其更廣泛的散布於歐美兩洲，形成爲當時的新運動。領導這新運動的，除法國的聖西蒙、傅立葉與英國的渦文外，在美國則爲萊特女士，在意大利則爲馬志尼。然而他們之從事此種運動，其目的，並不完全相同。有的祇是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同情於工廠制度下的勞工們的痛苦，在正義感的衝動之下，把那些人所受的痛苦，用委婉動人的文詞揭露出來，訴之於人類的同情心而已。有的則另有其更遠大的政治企圖，他們不把解除勞工痛苦這一件事，當作一個單獨的問題，認爲這祇是民瘼問題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們祇是想借助於勞工的力量，來達成其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目的，而對於勞工問題的本身，反而是不大十分感興趣的。前者如渦文與聖西蒙即是，後來則馬志尼實爲代表。不過他們的動機與目的，儘管如此其不一致，然而其中畢竟有其相同之點。那就是，在他們的思想中，已經把國家與

際聯繫起來，發現到他們自己，不祇是某一國家與城市中的一個工人，同時也是全世界各國勞動階級中的一份子，站在這一基礎之上，他們的思想與行動，便拋棄了以前那種狹隘的地方觀念，認為祇有在國際的聯合與協助下，才能實現勞動階級的解放，完成其所欲實現的目的。於是以前那些林立於各國的特別的勞動團體，至此便開始發生接觸，遇到別一國家的勞動者遭受什麼的不幸事變時，即盡可能的加以精神與物質的援助，如一八三六年，倫敦工人聯合會，因援助比利時工人之對比利時政府提出抗議即是。由於此種友誼的援助，遂使國際勞動者的情誼日趨密切，而發展以成爲國際組織，便爲極自然、趨勢了。

在此一自然的趨勢上，最先認爲必須把各國的勞動團體擴大爲國際組織，加以具體提出的，當推渴文。遠在一八一八年時，渴氏即發表這樣的意見，認爲：我們如果要澈底的改進一國勞動的狀況，那麼，各國必須實行國際合作才行。一八三一年時，英國的勞動聯合會，又重申此項主張，到一九三九年時，此項動議，已接近於成熟階段，英法兩國的勞動者，想在倫敦舉行一次會議，但由於這兩國勞動界領袖羅夫特與布朗克之被政府緝拿，致使其計劃未能實現。

然而此一會議，雖因領導人之被緝拿而一時停頓，但由工業的日益發達，交通與貿易繁榮之一天一天的開展，遂使國際間的經濟關係一天的密切，國際聯合的要求，愈成爲事實。

實所必需，在這時期，發布文字以鼓吹成立國際組織者便不止於勞工界，政治與商業團體的領袖，均認為有此必要了，於是在一八四三年，倫敦便開了第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為國際合作事業樹立先聲。就勞動界的情形言，此時又新加入了兩位宣傳煽動家，一個是法國的德利斯坦，一個則為德國籍的猶太人馬克斯。德利斯坦，於一九三八年，出版「勞動組合」一書，把國際勞動組織的意義與目的，具體的提供出來，其計劃中最主要的一點，是認為歐洲各國的勞動者，應衝破性別，宗教與國籍的藩籬，切實的聯合起來，努力於政治與經濟權的獲得。馬克斯與他摯友恩格斯，則往來於倫敦，巴黎與布魯塞爾（比利時都城）之間，宣傳他們的共產主義，而且對那次渴望得救的勞動界，發生一種極大煽惑作用，久而久之，便成為他們信仰的中心了。

自從這幾位宣傳煽動家與英法兩國的社會主義者聯合以後，整個的歐洲便為之不寧靜了。在一八四六與一八四七兩年度中，他們先後在倫敦舉行了好幾次會議，結果組成了一個共產主義同盟，參加這同盟的羣衆，雖祇有英、德與比利時這幾個國家的政治犯，但卻發表了一篇由馬克斯與恩格思起草的極重要的宣言，在這宣言中，馬克斯與恩格思很武斷的說，一切過去的歷史，均為階級鬥爭的歷史，此種鬥爭，愈到後來，愈益激烈，共產革命以後，中產階級已逐漸消滅，所剩下的，祇有資產與無產階級，這兩階級至互相搏鬥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的必然消滅與無產階級的必然興起，這是根據辯證法所無可逃

遜的一個運命，依照這一理論推衍下去，那末就用不着再加以人爲的革命力量了，然而他却積極的主張，無產階級，應當努力於奪取政權，然後再用政權來完成其社會改造的步驟，這就與他前面的說法自相矛盾了。其另一駭人聽聞的意見，即是說：國家是得勢階級壓迫失勢階級的工具，人類的組織，不當局限於民族與國家之內，尤其是被壓迫剝削的勞動者應當認定祇有階級的利益，不知有民族國家的利益，因此他最後便大聲疾呼的說：「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吧！」總之，這篇宣言，是對傳統思想表示其充分的反抗，同時也是共產主義者第一次具體的發表其主張，此種主張，是有極大的宣傳作用的。

宣傳祇是實行行動的初步，這一次會議結束後，他們便於第二年，即一八四八年，慘害法國的工人，在巴黎發生奪取政權的運動。此種運動，後來更波及於意大利與奧、匈等國，鬧得滿城風雨，一般急色兒的共產黨人。滿以爲社會革命的時期已經到來，然而結果却徒然使那些無辜的工人，遭受一次極慘酷的屠殺，於資本主義無動於毫毛，而勞動界的生活反愈淪於悲慘！從此以後，全歐勞動階級的運動，都銷聲匿迹，至一八五〇年，馬克思便宣布退出革命主義者同盟的中央委員會，趁這時機，他又發表了一篇宣言，謂：產階級如若獲得政權，非再經十五年到五十年的鬥爭不可，這算是他在運動失敗後，最後遮羞的一個辦法。

二 第一國際時代

自從一八四八年起源於法國的革命運動失敗後，繼之以一八五二年共產主義同盟的解散，於是彌漫於世界的共產革命高潮便成爲過去。此後十年之間，是資本主義勢力疲而復振的時期。在這時期中，由於機器效率的提高與其適應範圍的擴大，不獨使得農業與工業均有重大的改進，而且在美洲與澳洲以及密西西比河沿岸，還發見了許多可以移民墾殖的新礦源與新土地。於是失業的人數減少了，貨物的價格降低了，各種以改良工人生爲目的的法律從新頒布¹⁾。總之，資本主義的成效日見顯著，而它的弊害則逐漸減少。由於這種種，使得勞動者不復注意於政治的鬥爭，祇注意於經濟慾望的發展。爲滿足此一願望計，他們組織了許多的工會，希冀在這一興旺時代，得以提高待遇，改善生活，這都是可以在和平商洽中，尋覓一條妥協的途徑，用不着爆烈的革命手段。於是那般職業的煽動家，以再無可以發展長才的環境，便祇好掩鼓息旗停止活動。馬克斯本人，則蟠伏於倫敦圖書館中從事於理論的研究與資本論的寫作。革命空氣，便大大地緩和了。

然而此種緩和的空氣，盪漾得並不很長久。經過一個短的時期，一方面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達到飽和點，別無新的資料可以來填滿它日益擴大的食慾，祇有採用延長時間減少工資這一個老辦法，來維持它在競爭的場中所處的地位，他方面更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的

不均衡。工資高下的不一致，這一國家的工人所認為過於垂薄的待遇，在別一國家的工人看來，也許正是求之而不可得的優差。在此互相激盪的情況下，工資便普遍的降低，而工作地位，又常有被他人奪去的危險。於是便使得大家嚮想到，如果要使本國的工人得到較好的待遇，就非設法防止別國工人的乘虛而入不可。這樣一來，國際勞動者團結起來這個念頭，又在人們的腦經中復活起來了。

首先發動這個念頭的，是工業化已進於高度的英國勞動者，繼之而起的，則為渴望脫離專制實現民主政治的法國，此外在意大利德意志與俄羅斯，不獨人民方面，均或前或後的提出自由改革的要求，即政府方面，亦漸漸地弛緩了專制的權威，有進於和平改良的趨勢，在這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狀況下，大陸的勞動者與英國的勞動者，便於一八六二年，又斷而復續的開始發生接觸了。

促成這一次接觸的事端，是政治的同時也是經濟的。屬於政治方面者，是拿波斯的總工會，要求英國工人援助意大利的統一與獨立。其次；則是英法工人，同情於波蘭的民族主義者而自願募款予以援助。屬於經濟方面者，則因美國南北戰爭的發生，使得英法兩國的紡織工人，發生嚴重的失業恐慌。爲了這許多問題，於是在一八六三年七月，各國工人，便集合在倫敦舉行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所討論的，事實上並不限於上述諸問題的應付方法與解決途徑，大家所聚精會神的，反而是國際勞動組織怎樣促其復活的問題。對於

這一點，主張最力而且提出具體辦法的，則爲英國工人。因爲當時大陸各國的工資，遠較英國爲低，所以當英國工人向他們的廠主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時，廠主方面，便往往以招致法、德比各國的工人，來人替他們的工作以爲抵制手段，這是使他們感覺最爲頭痛的事也就是他們所以堅決主張請求，恢復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個理由。

英國的提議，首先得到法國方面同情的響應，於是至一八六四年九月，又在倫敦舉行了一次會議，到會者除英法兩國勞工領袖外，還有意大利與波蘭諸國流亡在倫敦的政治犯，其最令人注意的，則爲主持從前共產主義同盟的馬克斯。於是國際勞動組織，便由醞釀以達到成熟的時期，而莫性質，則依然與上項的共產主義無以異。

經過這初步的接洽後，至是年十月，第一國際便召開正式成立會。當時會中的意見，主要的分爲兩派，一派主張把它作爲國際間一個祕密團體，協助各國革命事宜的進行；一派則主張把它公開，策動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代表前一主張者，爲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馬志尼；提出後一主張者，則爲馬克斯。結果馬克斯的主張勝利了，會中的一切規章與大組織辦法，皆採納了他的意見，即開幕詞，也是確定他起草。不待說，這個名爲勞動組織的機關，至此又成爲推行共產主義的機構了。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者，是不會忘情於世界革命的。他們的所謂勞工運動，其目的不是爲工人爭經濟上的利益，而是運用工人的力量，去摧翻資本主義，達到攫取政權的目

的。這個用意，剛剛與參加這組織的各國代表的意見大相逕庭。英國工人所熱心的祇是工組合運動。法國工人則承繼了布朗克與蒲魯東的主張，所感興趣的，是信用合作與生產合作。³德國工人，則在於獲得普選權，提高其政治地位。意大利與波蘭，則在於獲得國際的援助，以完成其統一與獨立。在此種欲望各不相同的情況下馬克斯鑒於上次共產主義同盟被解散的覆轍，乃不得不極力的改用和平妥協的論調，務使各方面均能感覺他們的意見與目的，已包含在整個大會的計劃之中，雖然他在開幕詞的尾端，仍然盡量的指摘資本的弊害，而且說明此種弊害的祛除，不是職工組合運動與生產合作所能為力，祇有實現勞工專政，才能根本糾正這種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然就大體上說來，則比較共產宣言的主張，已經和婉得多了。

第一國際，是世界各國勞動者的中央政府，在其指揮之下的是各國的地方工會。地方工會，一方面是當地工人的領導機會，同時又是第一國際的分會，每年可以選派代表，參予第一國際的年會，由年會中產生一常務委員會，執行大會職權。所謂職權者，主要的計有四項，（一）調查各國的勞動情況，並研究其改進之點，藉以傳達各分會，使其互相通曉；（二）發行刊物宣傳他們的理論與主張，主要的，是散布共產主義的思想；（三）援助各分會作政治與經濟的鬥爭，遇有困難則互相協助；（四）執行大會所交付的決議。這幾項工作，以二三兩項最為重要，其餘都是例行的。

不過就另一方面言。第一國際，雖屬各國勞動者的中央政府，然而這政府的分子是由結合的各國勞動者參予或不參予，完全基於自行決定。所以在起初的時候，它的規模很小，參予的祇限於那極少數的幾個國家，甚至連那少數幾個國家的參加者，實際上亦不過是自稱工人代表的政治野心家，並不足以真正代表工人，更不足以概括林立於各地方的工會，此種情形，即英國亦無例外。加之，各國代表，意見紛歧，遇有問題發生，則明爭暗鬥，各顯身手，極難得尋覓一條折衷妥協的途徑，所能獲得全體通過的，祇限於那極少數的於全體工人均有利害的議案，如限制最高工作時間為八小時，以及女工與童工的保護事項，然而此種議案，不獨在事實上未見得可收預期的效果，而且在企圖奪取政權以謀整個解決的共產主義者看來，實在是支節瑣細已極。更有一事，足以為他們工作上起妨害的，是經費的困難。在成立的前幾年中，每年會費的總收入，還不過三百元左右，以致連房租與工資的開支，亦全賴捐募維持，常苦不給。以此種種困難遂使是實務進行，暗無聲色，直至一八六八年以後，才進入到發展的階段。

助成此種發展情勢。主要有經濟與政治的兩個原因。所謂經濟的原因者，即當時各國的工業，一天一天的發展，生產事業，一天一天的走上集中的途徑，因之勞資雙方的苦樂日形懸殊，而且妬嫉與仇視的心理亦日見厲害，積此種妬嫉仇視的心理遂不惜各走極端，訴之於最終手段，於是罷工衝突事項，便時有所聞，而第一國際，則乘此機會，一面同工人

進行宣傳，一面募款接濟，遂使其底於勝利而後止。這樣一來，自然會大大地博得各國工人的好感，而繪繹不絕的以加入其組織，便為極自然的趨勢，殊不知其用意固別有所在。其屬於政治者，即當時各國的政治體制，因受法國革命影響，普遍的掀動民主自由民族獨立的要求，而般從事於此項要求的政治運動者，失敗之餘，流亡各地，為謀解脫莫痛苦完成其目的計往往急不暇擇的為野心家所利用，至違背其本身的意義而不惜。在此種情況之下，第一國際，便得以匯合了這許多的細流，已成爲汪洋浩瀚的湖海了。

不過就另一方面言，第一國際的勢力發展得很快，但它內部的紛雜因素亦增長得很快。起初是當一八六八年在布魯塞爾的第三次國際勞動大會中，法國派的互利主義者與馬克斯所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已經鬥爭得非常劇烈。當時後者因為取得了英國勞動組合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勉強的戰勝前者，得以三十票對四票的多數，通過國有土地的議案，而且馬氏所著資本論一書，還博得當時與會的主要人物極大的稱贊，認為是指導社會革命一種極正確的理論。到第二年柏色爾會議時，馬克斯仍繼續勝利，打敗了許多的反對者，成為常務委員會的主要人物。不過就當時的一際而言，共產主義與勞動組合及社會民主黨之間，無論就理論與策略言，畢竟是不能完全融洽的，參加勞動組合的份子，多半是工人，他們所感興趣的，是滿足經濟的要求而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則是知識階級。他們所注意的，是偏重政治問題，而於經濟的要求，不加重視。再就共產主義與社會民

主黨的關係言，則前者主張階級專政，後者則不否認民主；前者主張暴力革命，後者則主張爭取議席着手，是目的與手段各異。惟其有這幾點不同，於是其合作自難緊密。而衝突得尤爲厲害的，則爲馬克斯與巴枯寧。

巴枯寧是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曾參加過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運動。他的思想，一部分承繼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的學說，反對一切政府，主張完全無礙的意志自由。但他與蒲魯東不同的，就是他主張以暴力恐怖與普遍革命的手段，去實現其獲得自由的目的。就這一點言，他真如馬克斯所批評，『是一個無定狀的大破壞家』，而馬氏則是一位好學的學者，他認爲革命的完成，是須按步就班的去實行縝密的計劃。如此魯莽滅裂的辦法，是不濟事的。惟其彼此的性情有這基本不同之點，故思想的衝突愈演愈烈。依巴枯寧看來，馬克斯之所謂階級專政，不過是以暴易暴的辦法，絕不能實現真正的平等自由。照他的主張如果要實現真正的平等自由，則不獨要消滅私產，而且要根本消滅國家，再回復到自由結合的社會。這個理由，實在是迂於幼稚滑稽，然而在當時，他却出之以嚴正的態度。再在實際方面，彼此亦互相攻訐，巴枯寧斥馬克斯武斷專橫，而馬克斯則斥巴枯寧爲陰謀家，企圖奪取權力。總之，彼此愈鬥愈兇，在一八七二年的海牙會議中，巴枯寧派終於爲第一國際所開除，率其徒黨以去，然兩派鬥爭並沒有因之停止。

在人與人的思想衝突之間，另一足以導成第一國際的分裂的，是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

爭與第二年的巴黎公社運動。這兩回事，實有連帶關係，前者為後者之因，後者為前者之果，而就其給了第一國際的打聲言，則同樣重要。原來共產主義者，是否認國家與民族的。馬克斯在他的宣言中，曾提出了「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祇有階級相同，才能利害一致，必須在利害一致的條件下，人與人才有結合的可能，否則即使勉強結合也是不會牢固的。^參因此他們便主張，世界上祇應當有橫的組織，不應當有縱的組織，換句話說，即祇應當有階級的組織，不應當有國家民族的組織。於是他們便下一個結論，即服從階級利益，反對國家民族，是勞動着第一個道德信條。

這個論斷的不衷於理，可以一例是無待駁斥，僅舉一例即可證明。一個家庭的組織，應該是一個系統的縱的組織，如果照共產主義者的說法，應該把家庭截分為幾個階級，父與父連合，子與子連合，但事實並不如此，甚至父子之間，即使偶有不和，一旦遇到外力進擾時，仍然連合一致，從事抵抗，因為不如此即不足以自存。由此可見，民族國家的組織是血肉相連，而階級的組織，則是利益交疏，絕不會牢固的。

然而這一簡單的理由，共產黨却武斷的加以否認，可是否認是沒有用處的，因為眞理並不必要獲得全體的通過，同時也不是口舌的爭辯所能作最後決定，而是要在事實的考驗中才能證明的。好了，這裏有一個考驗它的事實來了。當一八六八年時，普法戰爭正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期，各國工人代表方集會於北京新舊寒軒，馬克斯提出這個問題

來討論，到場代表均一致的表示，願站在同盟罷工這一條連合戰線上，斷絕對前方軍隊的食物供給，並普遍的發動社會革命以爲應付手段，此種態度，即普法亦無例外表示贊同。可是到了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戰爭真正發生時，他們的態度便完全變更了，德國人民，產生一種堅強國家觀念，認爲他們的行動，在合於正義的，法國人民，則在擁護祖國的旗幟下，報之以強烈的抵抗，結果雖然失敗，但工人無祖國這一句口號，則第一次的宣告其破產了。緊隨着這一事實而來的，是第二年三月的巴黎公社運動，這次運動，是法國工人繼一八四八年之後，第二次的作奪取政權的企圖，參加此項運動者，大部份是第一國際的會員，故第一國際對之，特別的予以同情的援助，並鼓勵，然結果徒然犧牲了一萬五千以上的生靈，革命政權，又如夢幻泡影的僅存在七十一天，便歸消滅了。

經過此一事變後，法國的勞工組織，完全被政府封閉，英國的勞工組合，以不滿意於馬克斯對巴黎公社事件的處置，便宣告全體退去，其他各國，鑒於巴黎公社事件的發生，深恐其傳播共產革命的種子，亦加拒絕，第一國際，至此便暗息僅存，以至歐洲無復活動餘地，乃將其會址移諸紐約，然從此便事實上停止活動，到一八七八年，即正式的宣告取消。

三 第二國際時代

在前節的敍述中，我們已經知道，自從一八四八年以後，第一國際便正式消滅了。此後五年，馬克斯復病歿於倫敦，由是這位煽動宣傳家的死亡與國際間社會主義聯會機關之不存在，於是瀟灑一時的社會革命運動，為之停頓。然過了一個時期，一方面由於那種不安定的經濟與政治狀態的刺激，他方面又以馬克斯信徒的到處鼓動，便使得社會革命的思想與運動，仍然在各國潛滋暗長之中。

此種潛滋暗長的狀態，尤以德法兩國滋盪得最為厲害。就德國言，當時的社會民主黨，雖然在俾斯麥的高壓與改良政策下，不能公開發展，然在祕密運動之中，其黨員逐漸增加，而團結亦愈形鞏固。法國則向來是自由空氣極濃厚的國家，因之以社會革命為目的的團體，發展得更為迅速。英國的工會組合主義，早就有根深蒂固的基礎，又因其主張並不十分激烈，故政府未曾加以干涉，能以公開活動。而在一八八〇年以後，又新增了兩個社會主義的團體，其一是希德門與柏恩思坦所組織的社會民主聯合會，其一是衛布夫婦與文豪蕭田納，威爾斯諸人所發起的費邊社。前者以研究馬克斯主義為目的，後者則以改革資本主義的弊害為主旨。工會組合主義者，得到了這兩個姊妹團體的贊助，其聲勢更趨龐大了。

同時，由於機器更廣泛的使用，生產事業更趨於集中而結果，使得社會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發達。除了英法德這幾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外，歐洲其他各小國以及美洲合衆國，像丹麥、瑞典、奧大利、瑞士、意大利等，也在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年之間，先後發生了社會主義黨；而且他們大都在議會中取得代議士的地位。此外在芬蘭與俄國，則社會主義者雖不能公開活動，但由於新思潮的影響，革命團體也在那裏祕密進行。與英法德三國的社會主義取得了聯絡。

在前面這一情勢之下，於是到一八八六年，各國的社會主義的政黨，又感覺到有恢復國際間聯合組織之必要，而首先提出此動議者，仍然是英法兩國的勞工領袖，經過好幾次初步的接洽後，到一八八九年七月，他們便在巴黎舉行一次正式的會議，而中斷了十三年的社會主義者國際聯合機關，便告復恢復了。

這次會議的期間，恰是法國大革命的百年紀念，法國政府，為慶賀其革命的成功與多年來政治與經濟的進步起見，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博覽會，各國人士，在其號召之下，雲集於巴黎。因之參加此次會議的代表，極為踴躍，數達三百九十一人。以區域言，計共二十國。舉凡歐美兩洲幾個重要的國家，與夫這些國家中的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大致都參加了。這是遠較第一國際時期為隆盛的。

會議中所決定的事項，主要的是國際聯合會的組織。其次，則為援助美國勞動聯合會

的三八工作制，即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此種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首先是由芝加哥工人所提出，預定在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促成其實現。當時美國並沒有派代表參加，大會係根據法國代表的建議，承認了此項意見，而且決定在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舉行國際示威運動，以響應其主張。這是三八工作制確立的基礎，也是歐美兩洲勞動運動作進一步接觸的起始。

第二國際成立後，共開過八次大會。其開會的地址與年度如下，（一）布魯捨爾，（一八九一年）（二）的爾西（一八九三年）（三）倫敦（一八九六年）（四）巴黎（一九〇〇年）（五）亞姆斯德丹（一九〇四年）（六）斯社格（一九〇七年）（七）哥本哈根（一九一〇年）（八）巴斯德（一九一二年）。第二國際的本部，成立時是在巴黎，至一九〇〇年後，^參則始終在布魯舍爾。本部的組織，分為國際社會主義部與國際社會主義會議兩部。前者為後者的執行機關，其性質等於常務委員會。由參加國各推代表兩名所組成。

我們知道，第二國際，是繼承第一國際的歷史而產生，同時，它又是依於分立的各國原有的勞動團體與社會主義運動團體而存在。因此，它便先天的含有若干不同的派系，此種派系，為數很多，僅就法國言，即有四種，但從其大體上區分，則一為可能主義，一為不可能主義，即一為改良，一為革命，一為非馬克斯派，一為馬克斯派。這兩派的最終目的，都在於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所不同的，是促成其實現的方法與策略。而方法與策略

之所以不同，則是由於彼此認識之不同。前者認為，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可能用和平的方法達到，後者則認為舍用革命流血的大手術，將資本主義澈底推翻，代之為階級等外，即別無途徑可循。法國的可能主義者與英國的費邊社，是前一派的代表；而德、奧、比利時與英國的民主聯合會，則屬後一派。這兩派之間，惟其有這基本不同之點，於是前者的興趣，便在參加立法機關，冀藉作一點一滴的改良，以進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部實現；後者則雖不完全反對參加議會，可是其參加的動機，不過是利用其進行煽動與宣傳，並不認為這是一道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橋梁，有了它便不須要革命了。這是這兩派意見不同之點，也就是導成後來所以分裂的一個原因。

除這以外，成為這兩派共同敵人的，則為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之加入社會主義組織，是第一國際崩潰的主要因素，然而在這次第二國際成立後，他們又改頭換面加入了。於是到第二國際成立後，為統一內部的思想與行動起見，對於一些分子，便又不能不加以肅清。此種肅清工作，前後歷四年時間仍未完成。至一九〇七年的倫敦大會中，才制定了一種規律，認為凡屬參加社會主義國際者，必須信仰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階級鬥爭與議會行動的手段，否則須一律退出。這樣一來，那般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分子，才徹底的被排斥去了，但第二國際本身的力量也因此削弱了。

不僅此也，前面我已經說過，第二國際的內部，早就蘊藏着分裂的因素，此種因素其

所以未致形表面化者，乃是由於彼此之間，尚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存在，故猶能容忍合作。迨至此共同的敵人肅清後，內中所潛伏已久的分裂因素，便作進一步的發展了。助成其發展的，則爲米勒蘭與柏恩斯坦事件。

米勒蘭爲法國社會獨立黨黨員，平日放言高論，亦以革命黨自居，可是當一八八九年時，他却放棄了他平日的主張與信仰，參加了華爾魯梭的內閣，充任工業部長。此一舉動，引起了反對與贊成兩種相反的批評意見，在贊成者看來，米勒蘭之入閣，並不是熱中利祿，祇是爲了援助法蘭西的民主政治，並促成其進步。然而在反對者方面，則指責他是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藉議會行動，以掩飾其個人攫取權利的卑鄙行爲。於是雙方便互相指摘，吵鬧不休，而法國之社會主義者，因此見解之不同，其意見更分爲兩派了。

柏恩斯坦爲德國人，¹平日亦以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者自命。而在一八九九年，他在其所發表的社會主義之研究一書中，對於馬氏學說，忽提出一種極重要的修正意見，認爲馬氏所自認爲創見的剩餘價值，唯物史觀。資產鬥爭諸說，均與實際事實不符。依照他的理論推衍下去，實無異於將馬克斯主義全部取消，而且也可以不用什麼革命手段，祇須循序漸進的改良，即可使社會進步的。這種意見，站在純粹學術的立場，本來，是很正確的，可是在共產主義黨徒們的眼光中，却認爲是離經叛道的謬說，竟至於在一九〇三年的德國民主黨黨員大會，把他開除了黨籍。然柏氏的黨籍雖被開除，而同情於他見解的人，依然還

多，這是武斷手段所無可如何的。

自從這兩件新事實爆發後，漸漸地在國際引起了一種普遍的影響。具體言之，即社會主義者之應否參加實際政治以及馬克思主義之是否有修正餘地，這兩個問題，便成為凡屬有社會主義者組織的國家，所共同討論的問題；
◎ 討論的結果，自然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有，於是這種爆發於德法兩國的爭執，遂漸漸地導成爲國際間的爭執了。

再就第二國際與英國的關係言，其意見之不調和，亦隨時間的演進而逐漸增加。我們知道，英國工會組合主義，原是一種社會改良主義，這與馬克斯無產階級革命之說，本屬意義各殊。至於他們之所以熱心於參加國際社會主義組織，與其說是希望社會主義實現，毋寧說，是基於維護其本身利益，具體言之，即防止大陸各國工人，以低廉的勞動代價為條件，去奪取他們的工作位置，這也是上節中所論過的。然而第二國際的行動，則不能使他們的願望得到滿足，這已經足以使他們感覺失望而降低其參加興趣與鬆懈其合作。同時我們還知道，英國在世界各國中，是工業最發達其殖民地最廣闊的國家，這兩個條件，都足以促進生產事業的繁榮而使其過剩人口，可能得到一個適當的發展其才能的場所，不致發生失業恐慌而引起其痛苦的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祇是資本家得到優厚的利益，即工人階級的生活，亦得以逐漸改善。而馬克思所謂工人痛苦隨實業發達遞增之說，便證明其與事實全不相符，這樣一來，遂更加強了工會組合所持的和平轉變的信念，認為社會

主義的實現，是可由逐漸改良的方法促進，不須要用大流血的革命手段。由於這種種情形，便使得第二國際的內部，形成了好幾種思想的對立，不僅可能主義者與不可能主義者意見無法統一，馬克斯主義者與修正主義者感情難以融洽，即社會主義者與工會組合主義者之間其信仰亦發生根本的歧異，而歷年以來所進行的內部整調工作，便完全歸於失敗了。不僅此也，在這糾紛重重之中，由於國際形式的轉變，使得它的內部，又增加了一項新的紛爭因素，那就是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衝突，後來第二國際的崩潰，即是由於無法調和此項衝突所造成的效果。

本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衝突，是第一國際所遺下而未解決的一個老問題。這個問題的本質，即是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所應採取的態度與方法。具體的說：即如果遇到本國與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時，一個社會主義者，究竟應當服從國家民族的利益以從事對外戰爭呢？還是應當服從階級利益以掀動對內革命藉以奪取政權呢？關於這兩個問題在一九〇〇年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中，即被提出討論。討論的結果，僅表示了如下的意見，即：戰爭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資本作祟，因此勞動階級，應認為一切戰爭都是有害的。並應當反對本國政府的特殊侵略行爲，否認戰爭債款。停止供給出兵用費，以達到廢除資本主義，建立合作共和國為目的。

就這次所表示的意見看來，它所反對的，僅是侵略行爲而已，但究竟何謂侵略，何

謂被侵略，這界限很難以劃分，而且在祕密外交盛行的時代，促成戰爭發生的真正原因，實不容易認識清楚，即使認識了，參以感情的作用，其是非曲直，也不易加判斷，所以這種表示，實不過是一些籠統含糊不着邊際的話，其所謂否認戰債與停付軍事費用，在事實也是行不通的。除這以外，當時本有許多人提議；遇到戰爭發生時，可採用同盟罷工的手段，使其陷於無法繼續進行，這從表面看來，好像是有效的，但究實言之，仍屬片面的主觀的運想，姑無論國家民族的不容易消滅？而且就利害的關係言，個人畢竟是附屬於國家民族而存在，一個簡單的「無產階級無祖國」的口號，而要把這種基於自然的感情與切身的利害關係切斷，這當然是絕不可能。這關係的切斷既不可能，則協同一致的罷工，行為，當然也就不可能發生。同時，就勞動者的力量言，如果真能出以同盟罷工來對付戰爭，那他根本就用不着同盟罷工，早已成為國家民族的主導了。惟其如此，所以第二國際對於這個建議，畢竟沒有採納。

國際的情形是愈演愈惡劣，戰爭的發生，已經間不容髮了。在一九〇七年的斯杜格會議中，德法兩國的代表，曾發生了激烈的辯論，互相斥責對手國的行動爲侵略，而且暗示，如果遇到戰爭發生時，我們不得擁護他們的祖國以從事於抵抗侵略的戰爭，在此種惡劣的形式下，第二國際的主持者，乃不得不又通過一次決議，主張各國的勞動階級與議會代表，應當在國際社會主義部的援助之下，採用適當的方法，來防止戰爭的發生。如果不

發生時，則彼此間仍應保持合作，使戰爭得以早日結束。這次議案，雖比較上次的說法，稍富積極意義，而因同盟罷工的提議之未被採用，則仍然是急進份子所認為不滿意的。從表面上看，社會主義國際組織中的急進份子，是盡了可能的方法去防止國際戰爭的發生了。果真是如此，那事情雖沒有成功，但他們的努力是可欽佩的。但按之事實，則他們的心理，與其說是防止戰爭，毋寧說是挑撥戰爭。因為依照馬克斯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戰爭是無可避免的，無產階級的任務，祇應當一方面拒絕參加國際戰爭，他方面藉此機會，去掀動國內的革命戰爭。才可以促成資本主義的崩潰與無產階級政權的獲得，這是他們所努力的中心工作。

他們對於此種努力，是一點也不放鬆的。當一九一四年七月，奧國的軍隊正向塞爾維亞前進時，第二國際還在布魯舍爾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想發動一種普遍的罷工示威運動，來表示其對戰爭的反抗，至八月一日，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本勒，還向巴黎的社會主義者聲明，他可以擔保，德國的社會主義者一定會採用堅決有效的行動，來阻止戰爭。然而當他這些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已經以一百十一票對十四票，通過了政府所提的戰時公債的議案，反對的，祇有考次基，哈恩，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等極少數人。協約國方面，則僅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尚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對戰爭，然至八月四日德國正式宣戰以後，他們也變反對而為擁護了。至於法國、比利時與塞爾維亞等被侵略國家的社

社會主義黨，則無不站在擁護祖國與民族的旗幟下，一致的對戰爭表示贊同了。甚至於國際社會部的主席樊德爾菲德，且加入比利時內閣，成爲戰爭的主持人。即那般平日放言高論的無政府主義者，此時也改變了他們的行動方向，相率跑上戰場，不惜流血斷頭，以從事於擁護祖國爲戰爭！

自此以後，國際社會主義的陣線完全瓦解，繼之而起的，是愛國情緒的高張，與民族精神的激揚！於是大家便互相攻訐，現爲這是一部份人的中途變節，其實則愛國家愛民族的情緒，本是基於天性，決不是其他生吞活剥的方法所能加以變更的，因此當時那種情狀的發生，決不能責備於某一部份的變節，祇能證明兵產主義理論的破產，人類固有的理性，衝出了片面的宣傳的蒙蔽，回復到了清醒的時期。

四 第三國際成立的經過

歐戰發生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均拋棄了階級鬥爭的主張，各自擁護各自的國家，以從事於戰爭，這已如前節所述了，然而在這時間中，社會主義的思想，並沒有完全隨之消滅，仍然在各國到處流行，祇是派別分歧，不甚統一而已。

當時流行於各國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大體上可分爲左右中三個派系，右派又謂之社會主義愛國派，這一派雖然信仰社會主義的理想，可是對於國家民族的觀念却不肯放棄，於是

便各自擁護其國家以從事於戰爭，至於其所正在進行的戰爭，是侵略抑是抵抗，他們是無暇加以考慮的。與他們的意見剛剛相反的，則為左派。這一派，以俄國的列寧與托洛斯基，德國的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法國的蒙拉迪為領袖。他們堅決的主張發動革命戰爭來代替國際戰爭，然信仰其說者甚少，所以又謂之少數派，還有一介乎左右兩派之間的中央派，這一派，以德國的考次基，柏恩斯坦，法國的郎達等。英國的麥克唐為代表，他們認為各國勞動者的擁護政府，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但倘方面，則又主張，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仍應當結合起來，設法促成戰爭的早日結束。這是當時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概略情形。

這三派的意見雖不相同，但其活動並沒有停止。一九一五年九月，各國的反對戰爭派即左派社會主義者，在瑞士的基莫德華村舉行了一次會議，出席的以俄國代表為最多。這次會議，發表了兩個宣言，一個是由德法兩國代表共同簽名，認為戰爭的責任應由政府担负，與兩國社會主義者無干，社會主義者所應做的事情，是切實團結起來，強迫政府立刻停止其互相殘殺的舉動。還有一個宣言，則是以大會的名義發表的。其內容，除以加重的語氣責備社會愛國派與政府當局及資本家外，其積極主張，亦與上項宣言相同。當時俄國代表列寧，還主張立刻組織一個新的國際，到各交戰國中去策動革命運動，祇因當時各國代表的目的，是希望結束戰爭，不贊成發動另一新戰爭，故對他的提議未加採納，僅設

立了一個委員會以來貫澈其議決案的執行。這在列寧看來，乃是一件非常遺恨的事。

不過列寧的動議，雖未被大會採納，但基莫德華會議的決定，却很快的在交戰國中，發生了一種動搖人心，墮喪士氣的作用，不久的時期，法國與德國，均同時發生一種普遍的反對戰爭的罷工運動，英國的情況雖比較好些，然勞動界對戰爭亦已生厭倦之心。俄國則已爆發了革命戰爭，秩序陷於不能維持。在此種情況之下，國際社會主義的聲浪，又復高漲起來了，於是至一九一七年春季，右派即社會愛國派主義者，又主張在斯塔克虹地方，召集一個社會主義的國際會議，以來促進戰爭的早日結束。可是這次會議，由於各國政府的拒發護照，又以英國海員工會之拒絕搭載參加會議代表前往，致此次會議，事實上沒有正式舉行。

斯塔克虹會議失敗後，和平的希望便完全斷絕，交戰國雙方，均聚精會神的以從事於戰爭，直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投降後才告停止。然而在戰爭剛要結束的時期，俄國的革命運動，却獲得意外的發展，緩和派克倫斯基所主持的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竟被布爾雪維克推翻，從此俄國的政權，便完全落到以列寧為首領的共產黨的手去。其產黨，是素來以無產階級專政及號召世界革命為職志的，迨到他取得政權後，自然是實行其平日的主張，不但在國內宣布了許多極端激烈的改革制度，將土地銀行工廠一切收為國有，而且廢言償付外債，否認帝俄時代所與各國訂立一切條約為有效。這種舉

動，自然會惹起各國極大的憤怒與恐怖，而不得不聯合以興問罪之師了。

不特此也，這種激烈的共產制度，對於整個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還有一種極大的威脅與染色性存在。受其威脅與傳染的侵害最大的，首先是經濟機構比較不健全的德與兩國。一八一九年春季，這兩國即發生過好幾次罷工示威運動，各派社會主義者中的急進份子所組成的斯巴達克黨，在工廠與海陸軍方面大肆活動，其目的在推翻政府，建立與俄國同樣體制的新政權，使整個社會陷於喘息不安！嗣後此種不安的情狀，逐漸擴及匈牙利，意大利與巴爾幹各外國，引起其政治上的騷動，即比較穩重的英法兩國，亦發生一種左傾的趨勢，而使其政府當局，感覺得不容易對付了。

在此一新形勢下，社會愛護派分子，覺得其權威有日漸凌替之感。乃策動一新的國際運動，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召集甫經停止撕裂的各戰國社會主義者，在柏恩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所討論的，有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大戰的責任問題，一個是對於俄國蘇維埃政制的態度問題，關於前一問題的解決，是採用一種打死老虎的辦法，是由大會發表一篇宣言，把責任歸罪於已崩潰的德帝國政府，認為與新的德國無關；關於後一問題，當時本有人主張，立即發表一譴責的文告，但因法國代表反對，始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預備到俄國去實地調查。此外該會還成立了一個行動委員會與第二國際改造委員會，前者是實地宣傳其主張，後者則是進行恢復第二國際的初步工作。總之，它自己是以繼承第二國際自命的。

柏恩會議的召集，在俄國的布爾希維克主義者看來，乃是國際間對他一種新陰謀的發動；其目的無非是在資本主義的庇護下，結合各國的勞動界以向之進攻。事實上，當時的俄國，已被各國所組成的聯軍緊密地包圍，軍事外交上完全陷於孤立。是時帝俄政府雖已被打倒，但舊日的王公貴族，尙據地稱雄，演成一種四分五裂之象。在此風雨飄搖的時期，他可能找到的外援，祇有國際勞動者以及左傾的社會主義者，如果這部份力量再被資本主義國所利用，孤立的蘇維埃制度，是絕難以自存的。在此種情形之下，於是當柏恩會議正在籌備進行的時期，他便匆匆忙忙的召集各國同情於蘇維埃政制的急進份子，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會議，而他們所朝夕盼望的清一色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大會，便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正式誕生了。¹根據上述，可知第一次共產國際大會誕生，完全是在抵抗柏恩會議，藉以鞏固蘇維埃政制的安寧這一意義之上成立起來的。

從草率匆忙中所誕生的共產國際，其不能十分完備，是可以推想而知。當時他們所發出去的請柬，數量頗多，但以莫斯科當時還在被包圍封鎖之中，各國對於它的防閑極為嚴密，因之到會的人數甚少。而且那般到會的代表，大多數祇能代表個人，而不是真正由各國的共產黨所推選出來的。因此在會議中，有許多的代表，便祇有發言權而沒有投票權。事實上，他們不過是以共產黨員的資格，到那目以爲是共產主義的祖國中去觀光一次而已。

這次會議的最大成就，是表了一篇煽動性的宣言。在那宣言中，許多與他們臭味不相投，意見不一致的各派社會主義者都被他痛罵一頓，甚至即中央派如考次基郎特格之流，以其不同情於階級專政的制度，亦被其指摘得體無完膚，認為這是妥協份子，比反動份子更罪加一等。最後他聲明他的主張，是消極的打倒右派與中央派，積極的重複其階級鬥爭的理論希望各國的勞動者，迅速的發動階級鬥爭，各弱小民族與殖民地，迅速的起而進行獨立，直至把資本主義送入墳墓而後止。

宣言中所表示的主張，並不完全是洩怨憤，乃是一極積行動的南針，共產國際以後的行為，的確是在掀動世界革命，所以各國之把它當洪水猛獸看待，並不無因的。

五 共產國際的組織

共產國際，是各國共產黨的一個總機關，但它所包含的分子，却不一定共產黨員，舉凡國際間的左翼工人團體，青年學生乃至婦女兒童，祇要是同情於共產黨的主張或具有同情的傾向而可以助長其勢力的發展者，都在它的吸收之中。就其組織言，則主要的分為三個部分，（一）總部，（二）支部，（三）附屬機關。前兩部是共產黨員，後一部則大體上為非共產黨員。在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着手組織的時期，本計劃把各國的共產黨發動組合與其他勞動團體，都納入一個的機構之中，但以其所遭遇的阻力很大，致使其計劃

未能實現，於是祇得於共產國際下，分設各種附屬機關，以分別進行各種工作。然則機關儘管分立，而他們的意志與行動，則是同受制於共產國際的支配與指揮，所以我們仍然可以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參加共產國際這組織的，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大會時，共有七十六個國家，其中五十八個為各國共產黨支部，十八個則為同情組織，黨員人數，則達三百十一萬八千以上，（見羣衆第八卷第九期）這是它發達到最高時期的情形。它的最高權力，是集中於世界大會。世界大會的召集，原則是兩年一次，有必要時，還得召集特別大會，但事實上，則歷次會議的期間並沒有依照這個原則，乃是隨事實而決定的。大會的主要任務有三，第一是審查理論，決定革命的策略以及組織方面的一切問題；第二是裁判黨內的一切糾紛；第三是決定執行機關的人選。此種人選，原則上是平均分配，大會將所有支部依其地域分為若干組，每組得選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代表參加執行機關，各國或各組黨部，可以提出候選人，但是否當選，則取決於大會。

大會閉幕後，其權力即由大會所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執行委員會是共產國際的最高統治機構。它不像其他勞工國際一樣，是一個聯邦式組織中的中央機構，而是各支部與附屬機關之上一個獨裁的主宰者。它有頒布緊急命令，管轄各國共產黨的權力，它可以取消或修正各國共產黨的議決案，它可以懲戒它的會員，無論是個人或團體，如果它認

爲有違背共產主義的理論或策略時，都可以依照其所犯過失之輕重施以警戒或開除的處分。反之，各國產黨的行動，必須對執行委員會負責，按時將其工作詳爲報告，各國共產黨召集全國大會時，須事先得到執行委員會的許可，同時在各國共產黨中擔任職務的人員，如未得到執行委員會的同意，亦不能自動的離棄職務，否則即視爲犯罪行爲。

執行委員會原則上每半年舉行一次會，^{此外每年還舉行擴大會議，擴大會議的出席者，不限於執行委員會其他各國的共產黨經執委會認可者，也可以參加的。此兩種會議，不能享用世界大會的權力，其議決案，祇能供大會參考而已。執委會的本身不是一個行政機關，其日常行政事宜，是由執委會所產生的常務委員會處理。常務委員會，是由三十個委員九個候補委員所組成，下設若干秘書處與組織，宣傳，新聞統計與東方等部，稟承常務委員會的意志以處理各種事宜。在一九二八年前，常務委員會的主席爲齊羅維夫，自齊羅維夫被開除後，主席一職，便隨之取消了。}

以上爲共產國際總部方面的概略情形，現在再來述一述它的支部的概況。所謂支部者，是指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而言，若就其自身來說，則即爲各國共產黨的總部。共產黨在各國的情況互不相同，有的是合法的政黨，有的是非法的祕密組織，就其大體的情形言，除俄國外，共產黨勢力最發達的國家，爲德國，法國與捷克斯拉夫，他們有自己所建築的固定的辦公處所，還有大規模的出版機關，辦理日刊，週刊與月刊，進行共產主義的

實傳。在國會中，他們也占有相當龐大的勢力，一九二八年，德國共產黨所得票數，爲三，二三二，〇〇〇張，法國爲一，〇六〇，〇〇〇張，可想見其力量的雄厚了。

其他歐洲各國，共產黨員人數以波蘭爲最多，此外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巴爾幹半島各小國，共產黨都是非法的祕密組織，至一九二三年以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因不勝政治的壓迫，大體已歸解散，即有少數殘餘份子，亦復消聲匿迹，不復出頭露面了。英國政府對於共產黨的活動，向極寬大，容許其公開存在，惟共產在英國的人數不過九千左右，因之力量甚爲脆弱，他們的活動方式，不過是趁星期休息的機會，徘徊於廣場公園中，對那些看熱鬧的閒逛者，發一些不中聽的牢騷而已，實際上的影響是很少的。歐洲以外，共產黨勢力最發達而人數最多的則爲中國。然共產黨勢力在中國之所以特別的發展，其原因並不是由於這一區域之適宜共黨的繁殖而信仰其說者之衆多，而是武力威脅所造成的效果。因爲自一九二六年後，共黨在中國，已成爲一個以武力爲基礎的叛亂集團，而不是一個僅藉宣傳以吸收信仰者的政治組織了。

各國共產黨，是以勞工階級爲基礎的政治集團，近代勞工階級的生活，是附屬於工廠，礦山，交通機構，公用事業機關而存在，同時又以都市爲集中之地。故共黨的活動與組織，是以各個工作場所爲單位，即是把各個工作場所的黨員們，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細胞。除此種工場細胞外，又把住居於同一區域的勞動者加以組織，構成爲街市細胞。把這兩種

胞連合起來，便形成爲地方黨部，集若干地方黨部而成爲全國性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就是各國共產黨的統治機關。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黨的最高權力，是由兩個小部團體號稱爲政治部來執行，政治部是代表執行委員行使其權力的，其性質等於常務委員會。

根據「布爾雪維克化」原則，各國共產黨的組織，是採用民主集權的方式，即每一政策的執行，在未決定以前，是容許各黨員有充分的機會發表意見，但一經決定之後，則絕無懷疑討論的餘地，更不許有消極或積極的反對行爲，否則即視爲違反黨的紀律，應受嚴厲制裁的。在蘇俄極有權威與勳勞的托羅斯吉與齊羅維夫諸人之所以被嚴重的處分，就是由於不遵守黨的紀律而另外組織反對派，對黨的政策進行積極的反抗之故。由這一點，可以見其毫不寬容一切都採極端的態度了。

共產黨之所以採取此種極端集權的手段，其原因並不完全基於一種政治的信仰，主要是事實上的需要。因爲它所進行的，是一種危險性極大的破壞工作，需要極端的祕密與迅速確實；事先不能讓多數人知道，又不能讓執行者有自由考慮的餘地，非用嚴格的紀律來貫澈其命令，則其任務是無從完成的。此種民主集權的組織方式，不祇適用於各國共產黨與黨員之間，同時也適用於共產國際與支部之間，即支部對於共產國際的命令，祇有無條件的服從，絕不容許反抗的。

各國共產黨的工作與活動，隨其實際政治環境之不同，因之方式亦不一律。在英法德各

國的共產黨，大抵是努力於議會行動→爭取政治上的發言權，并進行反侵略主義的宣傳。在波蘭與意大利等獨裁勢力發達的國家，則其活動是組織祕密會社，散發煽動性的宣傳品并聯絡工人，暗中進行革命工作。在其他殖民地與弱小民族，則是參加民族解放鬥爭與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在從事這些運動時所需要的經費，大部份是依賴共產國際的津貼，在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所支付於十七個支部的津貼費，計三四七，〇〇〇元，佔其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見國際勞工運動史），而共產國際經費的來源，主要的又是靠蘇俄。由於此種關係，遂直接的造成蘇俄在共產國際中的特殊勢力，同時也間接的構成各國共產黨與蘇俄的特殊關係。

共產國際在各國的活動，不僅事是利用它的支部作單刀直入的中央突破，而是採用一條四面包圍的連合戰線以向資本主義進攻的。在這條連合戰線下，有無數受它指揮運用的附屬機關，其最主要的，則為赤色職工組合。此種組合，是繼共產國際的成立而發生，它的計劃，是想衝入改良主義的陣營中，打倒非共產主義的工會領袖，奪取國際勞工界的領導權。它的鬥爭策略，是雙管齊下的，一方面採用罷工的手段，去實現經濟的即縮短時間增加工資的利益，以滿足勞動者的實際要求；他方面則不放棄其最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不以爭取一點小小的利益即停止其向這個目的前進的革命行動。由於前一策略之與改良主義派相同，於是他們便有一個短期的合作。但由其最後目的之相異，終於使其合作不

而維持到底。最後的結果，是赤色職工組合的分子，一律爲改良主義派所逐出，於是彼此遂在互相醜託中，遂分道揚鑣了。自此以後，共產國際對於爭取勞工領袖權的策略，是屬於它的會員，嵌入改良派的勞工組織中，去發揮其分化的作用，使對方防不勝防。此一策略所發生的功效，是在同一部門中，形成了許多重複而對立的工會，而共產主義者所希冀的共產階級連合戰線，便分裂爲兩條了。

除赤色職工組合外，由共產國際所領導的附屬機關，還有國際農民聯合會，國際婦女部，國際青年部，國際童子部，赤色體育國際種種團體，這是顧名思義，便可以知其性質與作用，無須瑣瑣引述。這些組織，大抵都是在一九二一年以後所成立，當時共產國際，是正在積極的進行世界革命運動，故祇要可以利用的地方，便千方百計的去伸入其內部，藉以擴張其勢力，發揮其宣傳作用，連對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也是不肯放棄的。此外還有國際工人救濟會與國際赤色救濟會，則是假慈善機關的名義以進行其共產主義的宣傳的，其任務在援助各國監獄中的政治犯，救濟因從事破壞工作而傷亡者的家屬，使那些受其恩惠者，在感激之餘，益對於所傳播的福音發生誠摯的信仰。當一九二五年時，此團體即曾以其濟會的名義，在上海武漢一帶活動，當時一般人還把它當慈善機關看待，不惜捐款援助，而不知其實別有政治作用。由這一點，可見其計劃的周密與其巧於利用保護色彩，以暗中進行活動工作了。

二十四年來（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共產國際的活動，有兩個主要的目的，一個是所謂探討蘇聯的祖國政權的鞏固；一個是造成世界革命運動。就這兩個目的言，前者是成功的了；後者則是失敗的。造成其所以失敗的原因很多。黨的組織過機關化，分子過於僵化，而其模樣又一般的低下，不能了解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學說的，為數極少。普通的黨員不過是在不滿意於現狀這個衝動之下才肯加入而已。迨至其發見現狀的改革不是用這種蠻幹手段，可以達此時，他們的想起與懷疑就轉向另一途徑上去發展，而不復聽聽於共產國際的指揮。此種現狀，尤其表現於勞動運動中最為著者。我們知道勞動者的 requirements 是滿足現實的需要，而共產主義的理想，則與現實的需要，相隔得非常懸遠，有時候，為了追求那遙遠的理想，不惜把工人的現實需要加以犧牲。這樣一來，自然會引起他們的反感，以促成連合戰線的分裂。

其次，在民族差別方面，各國共產黨的意見亦難融和。比如說吧，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為着這塊殖民地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蘇小兒族的勞動運動，則具與民族獨立自由運動之不謀分割。現在要把這兩個利益相反的國家的工人，形成一條連合戰線，忘却國家民族的界限，以致力於爭取共同的目標，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因為他們即使在理論上首肯國際主義，但支配各個人的行動確？畢竟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切實的實際利益，理論與利益發生衝突時，則前者之之後著犧牲，乃是必然的。

加之共產國際這組織，名義上雖為國際團體，而實際則愈到後來愈為蘇俄所把持，理論的制定者是俄國人，實際的指揮者又是俄國人，這般俄國人，是根據他自己的假定與自國的需要以發號施令；而各國共產黨，則是根據其政治與經濟情況以決定其行動方針，這個距離的罅隙，又是無法填滿的。

由於這種種，遂使得共產國際的組織愈來愈趨的鬆懈，而世界革命的行動，發展到了蘇俄蘇俄政權的時期，便一步也不能前進了。

六 共產國際的活動

共產國際與蘇俄政府，雖然是兩個組織，但究其實際，則前者的活動，完全是後者直接或間接的領導與指揮，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共產國際所致力以求其實現的一件中心工作，是造成全世界的革命運動。此一運動，乃是基於蘇俄外交上的需要而產生，關於這一點，列寧曾以如下的語句表明：「如果我們單獨革命，沒有其他各國的革命為之響應，那是無疑的，我們的位置是會被動搖的」！在此種為自己解圍的概念之下，於是布爾希維克的領袖們，便一致的認定，共產革命工作，不應當限於俄國，應當透過共產國際這一個新機構，使它儘量的向世界各國輸出，反之，則俄國勢必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轍，而有被國際資本主義絞死的危險：

蘇俄制度透過共產國際向世界輸出所引起的第一個影響，是歐洲勞動界發生一個普遍的騷動，此種騷動的主要潮流，是從事勞工運動的領袖，要求政治權利的擴張，工業勞動者，要求經濟環境的改善，農村勞動者，要求土地的分給，一般人民，要求物價的減低與生活情況的改善，還有那些從戰場退下的兵士，則要求工作機會的給予與保障，由這些點滴滴各個人的欲望所匯合而成的總要求，是整個經濟政治制度的改造，嶄新的勞動共和國的實現，這些要求大部份都是那些參加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所提出來的。

他們不但提出這些要求而已，進一步的為迫使各國政府承認這些要求計，還在歐洲發動一種普通的罷工運動。首先是意大利步武蘇俄的後塵，想造成一種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發生一種政治性的罷工，後來此種罷工更蔓延於整個的歐洲以至美洲南部。到一九一九年秋季，歐洲各國的工會組合主義者，在安姆斯特登舉行了一次會議，把各國的勞動團體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整個的力量。這個新力量，雖然與俄國共產革命的旨趣不盡相符，可是他們却提出了一個非常之符合於蘇俄願望的要求與行動，就是請求各國職工組合一致起來，打破列強對於蘇俄的封鎖政策，同時又以波蘭政府的反蘇俄之故，復發動一種普遍國際運動，禁止軍火從各國輸入波蘭，當時贊助行動者，主要的有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以及英國、德國與捷克斯拉夫的職工組合聯合會。此外法、奧、荷、意、瑞、比各國的工人團體，也大部份採取了一致的行動，對波蘭的軍事行動，給予一種極大的不便。故蘇俄

戰爭的結束與中國對俄封鎖的解除，與這一行動是大有關係的。所以列寧曾說：「蘇聯資產階級只要一動手來打我們，它的手就被它自己的工人捉住了，這並不誇大的，因為所以被捉住的原因，則是共產國際在各國所發生的分化作用之故。」

然而當時俄國的目的，並不以我鎮的解除敵人的撤退為止境，它的更大的企圖是鼓動各國內部的革命運動，整個的去消滅資本主義的存在。起先是從一九一九年三月起，德國即先後爆發了四次共產革命，結果雖都沒有成功，可是當時歐洲各國工人多都認為這是革命所必要經過的第一個步驟，並不因此灰心，相反的，各國夙來帶右傾的社會主義者，此時都相率轉入共產國際，自承為是『悔過的犯罪者』而柏恩國際，此時便僅剩了幾個領袖，羣衆都一起跑到共產國際來了。

一九二〇年，更是共產國際興盛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它在巴爾幹、意大利、法蘭西等處，發動一次普遍的革命運動，與這運動相配合的，是俄國內部的軍事勝利，把哥薩克、尤登利克、鄧尼金以及波蘭的反革命軍隊，都一起殲滅或驅逐出境了；紅軍把波蘭軍打退後，更乘勝攻下華沙，使得歐洲各國均驚然發生危懼；是年七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大會，計到會者，共有三十七個國家的代表，如東方各國的中國、日本、高麗、土耳其、埃及、波斯等國都是這次從新加入的。在這次會議中，除刪定了二十一條綱領，以限制各會員的思想行為外，並組織了一個赤色職工聯合會與安斯特登國際對抗，冀

藉以爭取國際勞工的領導權。

從大體的情形言，共產國際的聲勢，一九二〇年已達於頂點，至一九二一年以後，便由盛而衰了。造成其所衰落的原因，一由於俄國的放棄軍事共產制度，改行新經濟政策，二由於各國所發動的革命運動之相繼失敗。於是使得一般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發生動搖，又以不滿於共產國際的指導之故，紛紛自動退出。分組二所謂第二半國際以身之對抗，致使其產國際的人數因之減少，而勢力大為削弱。其給予它的打擊更大的，則為德國籍執行委員全體的辭職，這是因是年三月罷工失敗與夫共產國際指導失策所引起的反響。

在此種情況下，共產國際，乃於是年七月第三屆大會中，提出一個到民間去的口號以圖挽救。所謂「到民間去」者，就是要它的會員參加各種組織，一方面去發揮其煽動分化的作用，使其所參加的組織趨於崩潰；他方面藉以吸收各種份子的加入，以擴大共產國際的活動範圍。然而這一策略，在事實上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於是它又利用赤色職工國際，設法與其他職工國際取得連繫。最後又提出一個統一戰線的綱領，是議與一切社會主義者及勞動組織，妥協言和，切實合作，以應付從新抬頭的資本主義勢力。從此種容認就的態度中，可見其迫切的需要外來力量之資補充了。

經過長時期的磋商，至一九二二年四月，共產國際與第二半國際，雖然勉強在柏林舉行了一次聯席會議，然終以平日的惡感甚深，而當時又有許多實際問題之難以解決，

以致彼此弄得不歡而散，而此一輩固共產黨勢力之新策略又虛泡幻。不特此也，統一戰線的策略，不獨沒有把各派社會主義者的勢力聯絡攏來，而且反使內部的意見，分成為賛成反對與折衷三派，贊成的把統一戰線的意義解釋得非常之寬泛，不把它當做一個策略看待，而把它視為一種基本政策的轉變；反對派則根本拒絕與改良派合作；折衷派則接受其原則，而主張將辦法修正。這樣一來，遂使得共產國際不能下級發揮其權威，行使其命令，而它的支部形成爲獨立行動了。此種獨立行動的狀態，不祇存在於各國的支部，即俄國亦無例外。

於是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中，便不得不費極大的力量，來對採用此一策略的動機與目的，作詳盡的解釋與妥協的處理，然癥結却始終未盡消除。在這時期，國際方面，有兩項新事實發生，一爲意大利法西斯勢力的興起，一爲法國的佔領魯爾煤礦區。當時共產國際，曾擬發動罷工示威運動以資對付，終以未得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贊助，卒告流產，而妥姆斯特登國際與第二及二半國際，却在此時期切實聯合起來，揭起反對共產主義的旗子，至此統一戰線便完全失敗了。

不過統一戰線的策略雖失敗了，但它並不因此灰心，一九二三年六月，它又一方面繼惠英法與捷克工人罷工，他方面又在保加利亞扶植一個政治陰謀家獲得政權，是年十月，又支持德國共產黨在漢堡起事，希冀推翻政府，建立政權，然而這幾次運動，其成績均不

甚大，漢堡的革命，更遭受了重大的犧牲，前後被捕者達千餘人，革命政權，在未出母體以前即被絞死了。

在這幾年中，共產國際，不但其對外所發動的世界革命運動到處碰釘子，即其內部的意見，亦衝突得非常之劇烈！起先是當俄國內部改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其領袖的意見即出現異。蓋在新經濟政策下，俄國政府，僅名義上保持土地國有權，其餘一切農工生產事業，則仍然恢復了以前的私人營利制度，於是農業與工商業中，又產生出貧富懸殊的狀態，農民中則依其財富的多少，分成爲富農，中農貧農的三個等級。工商業中，則產生了許多的私人資本家。這種情況，在同情於新經濟政策的人看來，自然會認爲是進步與改良的象徵，而在不同意的人看來，則指爲係屬社會革命潮流的倒退，如果不及時加以糾正，則勢必重返於資本主義，而使艱難締造的革命成績，有前功盡棄的可能。

在反對者看來，新經濟政策所引起之另一影響，是工業之發展其速度趕不上農業，政府所經營的企業必不及私人企業的發達。因爲當時俄國的機械生產技術既不精良，而機器與原料又復缺乏，在此種情形之下，國營企業中以生產的成品，無論就價格與品質方面言，都不能在自由競爭的場合中，取得優勝的地位，惟有賴強制的手段才可持維，如果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容許自由競爭這一個原則存在，那政府就沒有方法去控制國民經濟，使其符合於理想的方面發展換句話說，即俄國勢必停滯於農業經濟，的階段，而不會走上工

業的途徑。無產政權，是建築在工業基礎之上，倘無工業停頓，則此產政權亦必不能存在。這是反對派方面所持的兩種最主要的理由。

然而這些理由，都不過是表面的空質言之，則無非是失勢的托羅斯基與齊諾維夫藉此政權得勢的斯大林與布哈林的一種口實。其是並非直我們可無須過問，所要要知道的，就是這種內部的衝突，不祇是表現於俄國，同時也反映於國際，就其反映的國際情勢而言，當時法國、英國的共產黨，大部份都是支持托羅斯基的意見以進行其反幹部派的鬥爭。如此種鬥爭，演進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逝世的時期，便達於表面化的程度。是年六月，共產國際總部，舉行第一次大會，主導即是討論這個問題。經過多次辯論之後，幹部派勝利。之後，德國左傾份子與法蘭西、意大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右傾份子，都受到被開除的處分。同時這根本馬克斯與列寧的遺教，制定了一個共產黨政綱。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向『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這句口號的真實意義，就是說，各國的共產黨應該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化為模範。更具體的，就是要他們遵照幹部派的意志以從事於革命工作。因為當時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已經是幹部派獨占勝利了。

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言，這次會議，祇是兩派鬥爭更激烈化之開始，並不是鬥爭的結束。自此以後，幹部派大權在握，更激度的進行一國社會主義化的工作，開始實行五年計劃，一心一意的推進俄國的建設工作，爲完成其最大的建設計劃，便對資本主義國家及蘇聯

取妥協態度。祇顧滿足俄國當時的實際需要，而把世界革命這句口號，拋諸九霄雲外了。此種政策，是大受反對的書籍，認為是背棄馬克斯與列寧的遺教，而把俄國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然幹部派亦復反感相謀。說他們的五年計劃，是在促進俄國工業的發展，改善俄國的經濟狀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這都是符合於國家的實際要求的。¹ 同時復引述馬克斯與列寧的遺言，證明在一定程度之內一個國家是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² 而又認為，世界革命的成功，是應當以俄國革命的成功為一個基礎，俄國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即世界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份；反之，俄國如果毫無成績表現，則國際革命工作更無着落了。

除這種理論辯駁與口舌的鬥爭之外，更有一具體的問題，引起雙方意見之不調和，那就是關於中國革命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之組織，雖至大戰結束後才開始，然而它的发展却非常迅速，以共產黨員的人數言，除蘇聯外，即以中國為最多。第一九二六年時，共產國際以蘇西俄所推動的革命運動之屢遭挫敗，於是轉而注意於中國，首先是執行「到民間去」這個原則，使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企圖奪取革命的領導權，至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奉行北伐時，其黨軍即在各地大舉活動，借着國民黨的精幹，以擴充其共產黨的工作。順應的觀察，中國的情況很與俄國相似，所以北伐工作是其共產黨成功的可能。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由於第六策輸失敗的結果，便引起共產黨總結的初步困難。反對派

括這一失敗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幹部派政策的錯誤，幹部派則遷怒於中國共產黨之左傾與幼稚，而堅決表明，共產國際的領導是沒有過失的。此外，在英俄兩國的關係上，此時亦極惡劣。英國在保守黨張伯溫的指導下，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封閉了俄國在倫敦的貿易機關，而赤色職工組合在英國的活動，亦受到嚴厲的排斥，於是又給予了反對派以一個攻擊的理由，認為是幹部派對外政策失敗中罪狀之一。總之，彼此互相攻訐，祇要有詞可藉，有疵可指，便無所不用其極了。

俄國政府與共產國際，對於反對派的活動，曾屢次的下過警告都沒有生效果，於是乃不得不採用更嚴峻的對付手段，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開除托洛斯基的黨籍，十二月，又開除了一百多個反對派領袖的黨籍。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中，通過了一個共產國際綱領，這是根據幹部派的意志所制定的應付國際局勢的策略，其意義，是防止內部反對派的活動多過於防止外來的攻擊的。

在這幾年中，基於蘇俄內部黨爭的劇烈，糾紛的造起，因之在其指揮下之共產國際，活動力亦逐漸微弱，故自第六次大會後一直間斷了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才舉行第七次大會，由這一點即可說明，在這期間，蘇俄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維持着正常的外交關係，用不着對外發動攻勢，所以也就用不着召集共產國際會議來對它的支部指示機宜。它所進行的，一是厲行一次二次的清黨運動，澈底的肅清反對派，以維持國家的統一，鞏固蘇維

換政權；一是埋頭伏案的來進行一次二次乃至於三次的建設計劃，訓練其軍隊，充實其力量，以迎接第二次大戰的到來。這兩種工作，都是不須要借助於國際活動，也就不需要各國共產的幫助的。

事情這樣過去，國際共產黨的影子，已經不復在人們的視線中徘徊了，然而到一九三四年，它又出現了。原來在這期間中，納粹與法西斯的勢力，突然抬起頭來，於是激起共產黨的反響，而不能不謀所以對付。其具體的對付方法，即是召集第七次大會。所以這次大會的召集，其目的不是向資本主義進攻，而是對法西斯帝作防禦。

同時我們還知道共產的最高理論，是把世界上一切的事物當做發展的看，發展到每一階段時，它的性質便變更了。在這一原則下，於是從前所視為極可怒的敵人，此刻便變為求拉攏而不可得的朋友。國際聯盟，以前是資本主義的御用工具，此刻他自己也加了。法國以前是一個貪婪驕武的國家，此刻却是他的最要好的朋友，民主政治，以前是虛偽而欺騙的無產階級的仇敵，此刻却成為防禦法西斯陣線的萬里長城，英法工會的右傾份子，以前是資產階級的猶腳爪，此刻却歡迎其參加反法西斯的同盟。總之，一切有利於反法西斯的都是好的，都是應受歡迎的。在這一前提下，於是『資本主義』『與帝制主義』這些名詞，便成了法西斯所特有的微號，而不復適用其他各國了。

自此以後，蘇俄便喝出『和平外交』這一句口號，所謂和平外交者，便是與一切非法

列斯家安培的一句真話：而共產國際，則根據這次會議所標示的方面，以進行其宣傳，而不復喝聲謂世界革命了。至於此後的活動，則因其性質接連於共產國際的幕前先行階段，容下節述之。

七 共產國際的解散

共產國際，從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成立於莫斯科之日起，以迄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宣布解散之日止，其生存的期間，計二十四年兩個月又二十天，比之它的兩位哥哥——第一國際與第二國際的壽命，算是長得多了。不過在它的生存期內，真正精神飽滿行動活躍的時期實為時甚短，由一九二五年起，其身體機能便發生障礙，雖然它仍在那裏勉強掙扎，但其對外活動，已是露着一種疲憊衰老的狀態，遠不及當年的旺盛，一九二八年以後，其內部衝突，更為劇烈，因之對外活動，簡直完全陷於停頓，已經奄奄一息，驅壳僅存。由此進行下去，其力量之不能振作乃至於解散，可說是必然的。如果照唯物辨證法的說法，則解散祇是一種變動，漸變的時期，則在老遠以前即已開始了。

促成其發生變動的，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蘇俄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一為法西斯勢力的興起，這在前章所說過的。所謂新經濟政策者，在我們看來，實在發見不出它與舊經濟政策有多大的殊異，在此政策之下，它所進行的工作，依然是走資本的老途逕，不外乎

發展大規模的國有工業，擴充國有農場，開拓國際貿易，一句話說完，就是要使那農業粗鄙昧的舊俄羅斯帝國，變成一個嶄新的工業國家，爲了達成這目的起見，俄國便迫切的需要外國資本與技術的援助，機器與原料的補充。迨至法西斯勢力興起後，它在對外的關係上，又增加了一種新的威脅，爲對抗此一威脅計，迫得它不能不在利取其重害取其輕。這個原則下，把誰是朋友誰是仇敵這一個問題，再作一次縝密的考慮，其考慮的結果，體念到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並不全部的是可憎惡的敵人，還可能找出它的朋友，這個朋友，就是它以前所說爲允許的民主國家。在這種情況之下，於是它無論在經濟或外交方面，都不能不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妥協，而放棄世界革命的企圖與行動，便由想屢已達於成熟而階級了。

在此一階段中，舊俄所執行的外交政策，是擁護國際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祇有齊羅維夫與拉德兒等少數人，才死死地固執着他們那句陳舊的舊界革命的口號不肯放棄，於是便做了新政策下的犧牲品。還有那些對唯物辨證法沒有學得精通的外國共產黨，如著名的孔培拉之流，亦被蘇俄政府一起逮捕，打入牢獄，即茨米托諾夫亦不能暢所欲爲，祇得懼口結舌，免觸刑網。這都是一九三六年間事。蘇俄因改變外交政策所涉及於內政方面的影響。至於這種變化在對外關係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更爲顯著而重大，足以號召世界革命爲職志的共產國際，在蘇俄外交政策所標示的方面下，它已不是無产階級革命的司令塔，相

反的，乃是反革命宣傳中的喇叭，喇叭中所放出來的聲音，不是激昂慷慨的進行曲，而是令人沈沈欲睡的搖籃歌。總之，在這個時期，共產國際，已經完全拋棄了世界革命的理想，其所進行的，表面上是統一反法西斯陣線的新任務，實際則是爲蘇俄擔任着對外宣傳工作，除了爲完成此一工作的意義外，它已無存在的必要了。

再就蘇聯外交上的個別情形言，在這時期，與它發生往來最密切的，要算是法國了。法國的左產黨，早已不能算爲極端左派。自從一九三五年賴伐爾到莫斯科遊歷後，法國共產黨受其暗示，更進一步的完全放棄其夙來反對增加軍費的主張，表示與右翼妥協，在勃羅姆領導下所組織起來的人民陣線政府，雖還仍在那裏叫囂宣傳，然而他們之所以叫囂的用意，不是要推翻民主政治，乃正是要保障民主政治的安全，不讓那些右傾份子，把民主政治帶入法西斯的途逕上跑。還有一件事使他們感覺惶惑不安而欲極力防範的，是法國政府的取消法蘇互助協定。因爲此一協定的取消，是蘇俄在外交上減少一個幫手，同時也是納粹德國新增一股勢力。除這兩點外，其餘一切，他們都可以與右傾份子妥協的。此一妥協的策略，在中國大復廣泛的適用，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國家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時期，忽然提出了「化抗日連合戰線的口號，並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一個「赴內難的宣言，表示願意『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土地的政策』。復進一步的作積極的聲明，『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

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的職責」。這些口號與宣言，無疑的都是受共產國際整個政策改變的影響。雖然在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切實履行他的宣言，但無論如何，他在口頭與文字中，是已承認放棄「暴動政策」，改為溫和態度了。

積極的博取民主國家的好感，消極的防範納粹與法西斯勢力的伸張，是蘇俄與共產國際，在此一階段中所施行的平行政策。一九三六年以後，國際共產黨在西班牙的行動，都是執行後一政策的試驗場所。我們知道，當時的西班牙政府，雖然有少數左派人物參加，然而在大體上，它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政府，其所執行的政策，也是民主主義的政策，此種政府與政策，是並不適合於共產主義者之理想標準的，而蘇俄之所以不惜出死力以援助者，其目的並不是對這個政府人物有所偏愛，而是因為他們是反對納粹與法西斯的一個伙伴。不特此也，當時反政府的國民運動領袖，到大多數是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他們的主張非常激烈，處決反革命黨，搗毀教堂，沒收私人財產及將工廠收為國有，這種種手段都是與蘇俄革命初期的情形相同。然而蘇聯當局，在答應供給西班牙政府以軍火與工農師的援助時，曾經強調提出一種要求，須以制止這般人的活動為取得援助的交換條件。由此可知，當時的蘇俄政策，不是在挑世界革命，而是積極的抑制世界革命運動了。

後此的時期，是納粹與法西斯勢力更度擴張的時期，同時也是蘇俄在國際中益陷於孤立危險的時期，始之有德義軸心的建立，繼之有德意日共協定的締結。雖然他們之所謂「其」，祇不過是利用人們厭惡共產主義的心理，來掩飾其侵略的陰謀，而其真實的目的，則是企圖破壞世界的現存秩序，藉以滿足其宰割弱小民族的野心，但無論如何，蘇俄的政治體制，是反爲他們所欲推翻的一個目標。則是無疑的。在此種情況下，蘇俄爲解除其威脅與危險計，在外上第一件要件的事，是尋覓與國之不使自己成爲孤立，在這三個前提下，它認爲就莫洛等民主國家，是靜止的，保守的，願意維護現存秩序而暫時不願發動侵略戰爭的，這都是符合蘇俄的願望而爲他所認爲是防止法西斯侵略一個可能的同盟者。因此他用盡可能的方法，去造成一種民主陣線與法西斯陣線對立的形勢，藉以延緩戰爭的爆發，並極力的避免担負戰爭的責任。總之，在這一個期間，蘇俄的和平外交，並不完全是一句宣傳的口號，而是成爲他所執行的一種國策，與革命初期之念念不忘於世界革命完全不同了。雖然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歐戰形將爆發的時期，他曾拒絕了英法的締結同盟的提議，反而與德國成立協定，同時又違反了他自己以前所成的不侵略他人一寸土地的諾言，以武力們佔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小國，並佔領波蘭與羅馬尼亞一部分的土地。這勢像是助長侵略的兇狠，而不是保障和平所應有的行動，但這在他自己仍然是有理由可以解釋的。因為外交政策，是隨環境而變換，就當時的環境言，德國之必然的會發動對波蘭的

侵略戰爭，以及英法之不能實踐援助波蘭諾言，乃是一個極顯著的趨勢，此種情況下，蘇俄對他自國的安全，自不能不未雨綢繆，先行防範，故德蘇協定的締結與波羅的海沿岸各小國土地的佔領，雖然引起了張伯倫與達拉第輩之惶惑與震怒，但就自利的立場言，仍與他所宣傳的和平外交並不衝突，因為他的和平外交，本是從保障自己安全這一點出發的。

根據上述，我們可以知道，自從一九二三年希特萊上台，法西斯勢力指頭之後，蘇聯即已逐漸的放棄其世界革命的理想，傾注於建設於一國社會主義的趨勢，嗣後此種趨勢日益明確而具體，至第七次大會之後，更完全走到了相反的途逕，無論在宣傳與行動上，都無不極力的維護和充，鞏固各國間的現在關係，所謂共產革命的口號，已經成了一具幽靈，早隨那般在黨爭中失敗的人一起埋葬，而不復為他的當權者所注意了。此一外交策略的轉變，給予共產國際的影響非常之大，具體言之，就是使它的作用一天一天的削弱，以致成為一種無用的贅瘤之物，因為共產國際之成立意義以及其所擔負的工作，完全是造成世界革命，現在既然蘇俄放棄了世界革命的口號，代之為一國社會主義與和平外交，那它的存在便無意義了。

再進一步言，它的存在，不特於蘇俄無益，而且反有妨礙：第一是惹起各國共產黨對蘇俄懷疑與責難，不願再受其縛束，而欲要求自由行動。這種懷疑與責難，是反映於第七次大會的決議與一九四〇年美國共產的自動宣告退會。第七次大會的決議案中有云：「在

解決一切問題時，應根據一個國家的具體情形與特點，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國共產內部組織上的事宜。由這決議，可知各國共產黨是極不滿意於共產國際的直接干涉的。同時我們還知道，共產主義，是否認民族特性的，現在既然說你決問題應根據一個國家的具體情形與特點，則國際主義已自撤藩籬了。再就美國共產黨之自動退出言，雖然表面上是說爲了要使美國的共黨不受佛里斯法案的拘束，仍能取得合法而公開的活動機會，但由此也可以證明，他們已不願遵守共產國際的統制，而情願遵守其本國法律。這就是民族主義克服國際主義的二種象徵。

在前述事實之下，共產國際是早已呈露了分裂的痕跡，在這一裂痕中，更給予它以有力打擊的，是蘇俄自身的利害關係。原來希特萊發動對蘇侵略戰爭後，蘇俄的抵抗，雖表現其無比的英勇，可是他在武器的製造，軍備的補充，資源的接濟上，畢竟是後起的國家，不能不有賴於英美的補助，而且此種補助，到現在還是感覺迫切的需要，同時在他的戰事上，又可以起一種決定勝負的作用，惟其如此，所以他不能不博得英美的好感，而共產國際的存在，則是成爲這好感中一種令人極不愉快的表徵，固然共產國際，早已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企圖與行動，然而它在歷史上所給予人們的印象，畢竟是消滅不了的。要使人們完全消滅這印象，則舍解散帶有干涉他國內政嫌疑的共產國際外，便別無他道可循。這樣一來，於是作爲國際勞動運動指導中心的共產國際，以前是爲了蘇俄外交政策上的需要

而產生，現在又爲了蘇俄外交政策上的需要而解散了。

從此一事件的經過中，我們可以得到一種認識，即國際主義，是經不起戰爭的試驗的，醉心於共產主義者，平日儘管放言高論，說什麼祇有階級的利益沒有國家民族的利益，但一到戰爭臨到，切身的利害關係，是會使這種詭辯無逃避的機會。共產國際的解散與蘇俄在這次戰爭中所表現的極端愛國精神，即是給我們一個證明。其次：國家民族的特性是存在的，因此各國的內政問題，是祇能根據各國的具體情形作對症下藥的解決，不是他人可以越俎代庖，也不是從他國抄襲一些公式所能爲力的。以中國言，是祇有三民主義符合於實際的需要，因爲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形所產生，而不是從各國抄襲來的。再其次，資本主義的制度，雖然有許多不合理而應該糾正的地方，可是它並不如共產主義的指責，完全是有弊無利，至少它對於生產效率的提高，是發揮它極大的作用，至於它在分配上流弊的糾正，則民生主義已是一副對症的良藥，共產主義的說法，即使別無企圖，亦是一種因噎廢食的辦法。其所以屢次掀動世界革命，卒致無結果而散者，其根本的原因，即在這一點。

現在共產國際已自動的宣布解散了，其所致於世界的影響，自然是能夠祛除世界的疑慮，促進同盟國精誠無間的合作，以迎接最後勝利之早日到臨，而站在中國的立場言，我們尤希望中國共產黨之早日覺醒，務棄其錯誤而固執的成見，切實履行牠自己的諾言，爲

三民主義實現而努力，則此事件對於中國所發生的影響，必較各國的效果更為優良！

329
4021

D2564

著者：高伯琪

書名：共產黨國際史略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329
.....4021

登錄號數 D2564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共產國際史略

全一冊實價十元整

著作者 袁伯琪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版權所有不
准翻印

印 刷 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一八一號

578
20131

